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

汪金祥 回忆录

(一)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编 号 0095

内部史料

请勿外传

在东北公安保卫战线上

(征求意见稿)

汪 金 祥

许青航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日

几 点 说 明

许青航同志：

这个回忆材料，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写回忆录的指示，在我口述的基础上，由执笔同志翻阅有关历史档案和走访一些当事同志，而综合整理出来的。其中，在事实叙述上，在情况分析上，在问题提法上，以至在选材和表达上，定有不少错讹、疏漏和失当、欠妥之处。由于我只看了这个材料的前两部分，后几部分，因病体不支，没有过目。所以将材料送去，请能帮助核对事实，补充材料，斟酌分寸，提出修改意见；如有可能，更欢迎动手修改。为了便于了解情况的同志审核，特再说明以下几点：

一、东北公安保卫工作，是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东北的经济建设，直接服务的。因此，在每个不同阶段，我都把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做了简要的介绍，以与大局相銜合。

二、材料的整理，主要是采取个人回忆的形式，通过东北公安工作的一些重要侧面和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着重写党的领导，写干部的努力，写群众的支持，力求客观地反映出东北九年的对敌斗争过程。

三、在九年斗争过程中，东北各省市公安机关，都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和东公部的指导下，配合军队和有关部门，做了

大量工作，有许多贡献。因为这个材料是以东公部足迹所到之处为主线的，所以只能做面的涉及，而不能逐一进行具体叙述。

四、情报工作是当时东北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完成对敌斗争任务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邹大鹏同志。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实，在必要章节中，写进了某些情报人员的事迹，未涉及情报工作的整个内容。

五、在写法上，主要是要求用具体材料反映出当时的思想认识、经验积累和执行政策的基本过程。有些章节材料不足，待知情的同志加以补充。叙述中涉及干部的地方，一般是记名述事，只对邹大鹏、陈龙同志做了简要的评介。

望接到此稿后，能拨冗审核，并于明年二月底以前，将修改意见和本稿一并送中央公安部政策法律研究室海伦同志，以便最后修改，供研究东北公安史时参考。

汪 金 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向东北进军·····	1
第二章 沈阳初战·····	7
第一节 东北情报队伍·····	7
第二节 打碎日伪警察机器·····	13
第三节 敌人反扑·····	20
第四节 夜歼暴徒·····	25
第五节 转移·····	30
第三章 从本溪到海龙·····	35
第一节 炼铁工人武装起来了·····	35
第二节 出击国民党·····	40
第三节 关键在于区别·····	45
第四节 粉碎“血樱团”·····	49
第五节 蒋日合流阴谋的破产·····	53
第六节 蒋记地下军剖视·····	60
第四章 北上长春·····	65
第一节 群魔之都·····	65
第二节 一份军事情报·····	70
第三节 回马灭余寇·····	75
第四节 挖除混进来的敌人·····	79
第五节 面上的清扫·····	84
第五章 在哈尔滨站稳脚跟·····	88
第一节 “小巴黎”·····	88

第二节	东北局发出指示·····	94
第三节	关键的一战·····	100
第四节	“蒋干”六次过江·····	110
第五节	教堂魔影·····	119
第六节	抢救失足青年·····	126
第七节	土改反霸的风暴·····	131
第八节	改造旧城市·····	139
第九节	两次除奸保卫工作会议·····	146
第十节	收复沈阳前夕·····	156
第六章	东北全境解放之后·····	162
第一节	风扫残云·····	162
第二节	一撮美谍的末日·····	168
第三节	大张旗鼓反旗鼓·····	174
第四节	长白山风雷·····	184
第五节	海外“游鱼”设网·····	196
第六节	“引蛇出洞”·····	206
第七节	捣毁会道门妖窟·····	213
第八节	“圣母军”的溃灭·····	219
第九节	战犯的新生·····	226
第十节	新时期的新任务·····	247
第十一节	三反运动与队伍建设·····	255
第七章	新的起点·····	264

第一章 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中国人民的反攻和苏联军队的参战下，日本侵略者山穷水尽，发出乞降书；当月十四日，终于接受《波茨坦宣言》，全部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早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根据抗日胜利即将最后到来的英明预见，做了收复失地、开创新区的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日本侵略者发出乞降书的第二天，又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了进军东北的战斗命令。大令一发，一支有十多万名干部和战士的革命大军，即刻从延安，从山东、晋察冀、冀热辽等解放区，浩浩荡荡地分批开赴东北。九月三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者正式签字投降的那一天，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队伍进入沈阳。紧接着，各路革命大军又分头接收了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这支革命大军凭着战士的两支脚板，同军舰、飞机运送的蒋军抢速度，捷足出关，首先踏进了东北广袤的土地。

这是一次异常振奋人心的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进军。因为从这一天起，就永远决定了整个东北的前途和命运。东北，既不再是日伪法西斯的东北，也将不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东北了。党的阳光将普照于白山黑水之间。蕴有无尽宝藏的东北大好河山，将重返祖国的怀抱。被日伪蹂躏践踏十四年的三千万东北人民，将勇敢地站立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谱写祖国历史的新篇章。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东北解放区，即将在同蒋介石反动派的斗争中，跃然横空出世！

我们接到转赴东北的命令，是在九月初旬。那时，我和叶良庚等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正率领着一百八十多名党政干部，渡过黄河，来到晋东南桐峪镇。准备在这里稍事休整，即驰赴华东天目山区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我们到达桐峪镇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保卫部长杨奇清同志兴冲冲地赶到我们住处，向我们全体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电令。他说：

“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占领东北这个重要战略地区，夺取全局斗争的主动权，中央命令你们赴天目山区的全体干部，立即迅速转赴东北！”

这道命令如同布阵的令旗，催军的战鼓，一下子把我们的战斗意志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立即组织干部座谈讨论，进一步武装思想。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大家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摆出了我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看到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及其必胜的前途；并且怀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纷纷激动地表示：

“中央把这样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们，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

“我们一定要以最快速度到达东北，赶到蒋介石的门口去！”

“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我们都要顶得住，斗得赢，打出东北的新天地！”

做锄奸保卫工作的同志们，则估测着敌情，交换着想法，决心深挖横扫那些在东北的日伪法西斯势力和美蒋反革命势力。

我们这支队伍，当时叫南方干部第一大队，成员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是在江西、福建等苏区参加过土地革命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有些是在“七七”事变后从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奔向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锄奸保卫干部中，象王缙、蒋浩、

黄宣文、程强、王初、汪吉等同志，都是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老干部。他们虽已离开老家很多年了，这次又满怀激情做好了收复江南鱼米之乡的战斗准备；可是，当中央命令他们转赴生疏而又寒冷的东北去的时候，都愉快地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个别思想弯子转得较慢的同志，也很快地跟了上来。他们胸里装的是革命，脑里想的是全局，眼里望的是胜利，所以就能够志壮胆豪，敢于趋艰赴险，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何任务。我们几个领队人，当时看到这种情景，都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这些经过延安整风教育和由党的七大会议精神武装起来的同志们呵，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党的坚强战士。他们即将投到东北的革命洪流中去，同千千万万这样的革命战士一起，成为我们党在东北赢得全部胜利的可靠柱石。

于是，我们信心百倍地率队徒步出山西下太行，入河北，转冀东，绕道山海关西面的九门口，由辽南前所车站上火车，直奔沈阳而去。

一路上，我们受到了解放区群众极其热情的接待和支援。每到一地，群众都腾出好房子给我们住，做上好饭菜给我们吃，送来新鞋子给我们穿；并且主动探听敌军动静，帮助我们站岗、瞭哨、引路、护送，使我们从最安全的地方，顺利地通过了同蒲路和京津路上的两道军事封锁线。什么敌军据点、地主武装，都没有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许多群众殷切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在东北站稳脚跟，打垮蒋介石反动派，不要让中国老百姓再吃二遍

苦了。”群众的希望、支援，我们深深印在心头，平添了无限勇气。虽然行军路上，我们三遇上北方的雨季，有时又靠夜间走路，甚至还有小股敌人尾追；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一天总要按原定计划，赶上百里以上的路程，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有的同志风趣地说：“一穿新鞋，脚下生风啦！”群众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再一次切身体会到，取得象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对于巩固已有的胜利和取得未来的胜利，该是多么重要呵！

但是到了东北，群众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了。我们住在山海关北面的前所和沈阳西北四十里的马三家子时，具体了解到，群众对于压迫剥削他们的日伪法西斯势力，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不愿再当“亡国奴”，强烈要求翻身做主人。但是也听到一些群众的背后议论：“穿着二尺半灰袄，土里土气的，是他们打败日本鬼子的吗？”“能敌得过国民党正规军吗？”“恐怕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吧！”日常接触，他们多用观察的眼光神态对待我们。亲近中露出疏远，赞许中掺杂有猜測，期望中含着疑虑。这里隐藏着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这种表现，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知道，那是他们长年累月地受了日伪奸奸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必然结果。相信经过艰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很快地同我们站在一起进行战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严肃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强调从本质上认识和掌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看来，同蒋介石反动派争夺群众，将是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根本关键性问题。群众工作做得好坏，将最后决定我们在东北的成败。

在锦州东站长换乘时，一些铁路职员围上我们。他们一面诉说亡国奴的痛苦，一面向我们探询说：“你们来了，还要不要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汉奸看待呀？”我们当即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劝告他们赶快转变立场，站到人民这边来，然而他们还是有些将信将疑。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日伪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为了活下去，而在日伪政治经济机构中担任某种职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有政治污点或一般劣迹的人，为数不少。我们对他们是争取教育还是排斥打击？应当采取何种政策？这个问题，必将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成为我们在东北团结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人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类谈话，对于我们很有益处，它启发我们开始思考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了。

这次行军，我们跨过四个省，行程五千多里。我们经过华北地区时，一些重关要路，日伪军队仍在扼守着，他们等待国民党的收编，不肯向我军缴械投降。蒋军则正在北犯，敌机不断从上空向北运兵，在一些地区，他们已经燃起了内战的炮火。为了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许多军政领导同志都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去了。仗打得很漂亮。我们刚到冀东，就传来了胜利的捷报。彭老总率军在邯郸一带，打垮了数万蒋军的进犯，高树勋率部起义，给了蒋介石反动派挑动内战的阴谋以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到了山海关附近，夜里可以遥遥望见为蒋介石反动派运兵的美舰上的灯火，我军正和已在秦皇岛登陆并企图出关北犯的蒋军激战着。在东北，一些日伪残渣余孽和“曲线救国”派们，则打着国民党旗号，招兵买马，大建其军，

大肆发展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抢占东北。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公敌蒋介石已经兴师动旅地下山抢桃来了。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同关内的情形一样，东北上空也翻滚着战云。东北的山山水水，不可避免地要在这次内战中，经受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而我们，则即将在伪奸保卫战线上，参加这场解放东北的尖锐复杂的战斗，为最后解放全中国做出自己的努力。

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最后决战的号角吹响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新时期，正在拉开它的帷幕！

一 东北情报队伍

我们住进沈阳西北郊马三家子村时，东北已是银装素裹的严冬时分了。十一月三日，我们坐上东北风调的轻便胶轮大马车，在北风的呼啸声中，驰过白雪复盖着的广阔田野，逦入已由苏军军管了的沈阳市区。我们这些南方人，初度领略北国风光，又为终于到达目的地，而精神格外抖擞，都切盼着早一天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沈阳，日伪时起用清代的旧称，叫做奉天。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就向辽东半岛和沈阳以南地区伸进了魔手。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它又取代沙皇割去我国旅顺、大连，设为关东州，划归日本版图。在沈阳，则割租借地，兴工厂，办学校，勾结军阀、官僚培植亲日派，极力扩大自己的侵略势力。特别是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鞍山、抚顺、本溪等钢铁基地，掌握和控制了沈阳以南、以东的交通命脉和经济命脉，使沈阳及其周围成了它侵略东北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九一八”侵略的炮声就是首先在沈阳响起来的。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它更把多年扶植的大批反奸扶上台，进一步严密了各种法西斯统治机构。沈阳于是同长春、哈尔滨一起，成了它统治东北的三大首要城市；而且比之后两个城市，又与日本侵略者有更久的渊源。显然，这些日伪势力，是蒋介石反动派借以利用驱使和我们争夺东北的一支天然的反革命力量。

这就是沈阳的历史和现实，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局面。

于是，到沈阳的第二天，我和叶长庚等几个领队人，就到住在和平区三经路的东北局机关去报到，要求分配工作。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和组织部长林枫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彭真同志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形势，交待了任务和政策；然后又亲自到我们住处，向全体干部做了动员报告。数天后，林枫同志就把我们这批干部中的多数，分配到锄奸保卫战线上来了。

我当时被分配到东北局社会部工作，参加沈阳市委，兼任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暂时带一批干部到沈阳市公安局去坐阵领导，要求尽快地把沈阳市内极度混乱的治安局面整顿出个样子来。同时要 and 情报工作领导人邹大鹏同志接头，酝酿健全和充实东北局社会部机构，以便在东北境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适应整个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那时，邹大鹏同志已从山东解放区先我两个月来到沈阳。我怀着共筹锄奸大计の迫切心情，同他会了面。

邹大鹏同志是辽宁省辽中县人，熟悉东北的地理民情，曾任过满州省委委员和东北民主抗日联军邓铁梅部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职务，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夙有功劳。抗联受挫后，他转移到延安、晋绥解放区，然后到山东任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长，一直搞东北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同东北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有密切

的历史联系。他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在情报工作方面有卓越贡献，是我们党在情报战线上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我和他接头后，知道情报人员已经报到。他同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和从解放区单线派遣的情报人员已经接上关系；还和“东北救亡总会”中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徐寿轩、宁武、巩天民，以及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秘密党员高崇民、阎宝航、于毅夫等同志，以统战形式，建立了工作联系，并通过他们争取和团结东北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阶层，获取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的情报。在短短时间内，邹大鹏同志已把东北的情报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了。

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和民主抗日力量，本来是有雄厚的组织基础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满州省委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及其外围进步力量，遍及许多城市和农村。拥有数万战士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南满、中满、北满等山林地区，顽强地战斗着，严重打击了日伪法西斯统治。但是，由于日伪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无耻出卖，到一九三六年前后，我方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地下党组织几乎全被破坏了。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了整个东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火种不久又燃烧起来。一个受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情报组织秘密地正式建立，开始打破了革命低沉的局面。这支情报队伍，当时叫做“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有情报干部六十多人，分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等大中城市，并分别打进了这些城市的某些政府、军队、警察、银行、学校

和协和会等机构内部。甚至在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身边，在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周围，都布下我们的情报力量了。他们巧妙地隐蔽着，积极地活动着，向我们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日本侵略者垮台之后，这支情报队伍又乘有利时机，在组织上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一些拥护我们党的合乎做情报工作条件的进步知识青年被吸收进来，进一步形成了一支深入敌区的有战斗力的地下尖兵队伍。

在这些情报人员中，应当提到张绍纪同志。他是伪满大汗奸张景惠的儿子，由于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对张景惠的汗奸卖国行为素有不满意，在思想上产生了革命的要求。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堂兄、中共党员张绍维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地锻炼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情报人员。从此，张景惠的官邸，实际上就成为我们情报人员联系接头和传递情报的最安全的据点了。这个据点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苏军进入长春以后，愚蠢无知的张景惠和他属下的伪满大臣们，又从他们顽固的汗奸本能出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们暗中计议：“苏联要统治东北，还得象日本人那样，利用咱们这些人”，“多谢老天爷保佑，咱们捞一把的机会不是又到了么。”于是，他们决定由张景惠出面，按蒋介石向日伪残余广播讲话的旨意，组织“治安维持会”，并试图同苏军司令部联系，妄图取得承认和保护，以便顺线搭桥，易旗换冕，再次继续他们的傀儡生涯。然而，由于张绍纪同志知道了他们的这一意图，他们的黄粱美梦很快就象肥皂泡一